清史研究前沿 · 政治制度与政治史

甲申易枢后军机大臣关系侧影

——《许庚身日记》之枢臣交游与议事

刘青峰

[摘要] 甲申易枢后，军机处相对稳定了十年，其间枢臣亲疏与议事情况构成甲午战前重要的内廷政情。许庚身与孙毓汶关系最紧密，其与醇王奕譞亦久有政治联系，甲申易枢后二人仍公私往来频繁。遇有重要事件，慈禧太后会命奕譞参与决策，形式有公议、函商、“过府”等。奕譞凭借与枢臣良好私交及慈禧赋予的权力，权势较重；许庚身、孙毓汶因得帘眷与奕譞青睐，且久兼总理衙门大臣，权势突出；礼王世铎地位崇高却因资历、兼差等因素，权势较弱。《许庚身日记》为研究此时枢臣关系与议事权力提供了重要视角，还暗示了光绪十六年奕譞病逝后，世铎与孙毓汶的权力争夺。

[关键词] 甲申易枢　《许庚身日记》　军机处　奕譞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2－0052－013

光绪十年（1884）三月，因中法战争中清军北宁之败，慈禧太后利用言官盛昱之折，将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罢黜，易以礼亲王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即为甲申易枢。甲申易枢后，军机大臣人员相对稳定了十年，除了光绪十年五月至七月左宗棠短暂重新入枢，光绪十二年九月阎敬铭因病罢直，光绪十九年十二月许庚身病卒，徐用仪代之进入军机处外，其余时间军机大臣构成人员未再有大变动。直到甲午年清廷对日战事屡屡受挫，上谕以“额勒和布才欠开展，张之万年逾八旬”[①] 将二人罢直，改命奕䜣、翁同龢、李鸿藻重入军机处，刚毅开去广东巡抚以侍郎候补入直，实际上大体重回了甲申年的军机处班子。对于甲申易枢及相关诸军机大臣，晚清民国以来评价大多不高。李慈铭在易枢后数日谓：“枢府五公悉从贬黜，而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②] 李鸿章则称：“更事较多之亲旧一朝同罢，汲引乳臭陋儒。”[③] 民初张謇开始自订年谱，其回顾往事，甚至将朝局国

[**收稿日期**]　2025-02-21
[**作者简介**]　刘青峰（1992—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liuqf@cass.org.cn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2024QQJH081）阶段性成果。

① 《清德宗实录》卷 352，光绪二十年十月壬戌。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十七日，广陵书社，2004 年，第 10245 页。

③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十五日），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371 页。

变归咎于甲申易枢：

> 自恭王去，醇王执政，孙毓汶擅权，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问。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变，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变，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变，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变。因果相乘，昭然明白。[①]

晚清民国的评价相沿至今，[②] 兼之甲申至甲午间国内外局势相对平靖，甲申易枢后诸军机大臣的研究整体而言显得不足。[③]

军机大臣是皇朝体制重要的一环，在清代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史稿》谓之“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常日侍直，应对献替，巡幸亦如之（明降谕旨，述交内阁。谕本处行者，封寄所司。并册藏存记人员，届时题奏）”。[④] 军机大臣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无疑对清廷的决策有所影响。因此，考察甲申至甲午间朝局，军机大臣是绕不开的话题。日记在历史研究中具有特别的史料作用。它基本排日记事或隔数日补写，有学者形象地表达日记是“将作者的言行、见闻、思想乃至情绪，随时定格、固化后，‘镶嵌’在特定的‘地层’中”。[⑤] 军机处为枢要之地，军机大臣又往往行事谨密，故除翁同龢有较完整的日记传世，其他军机日记大多残缺，且记事简略，常令研究者大失所望。[⑥] 甲申易枢后诸枢臣目前仅见许庚身留有军机日记。许庚身的军机日记稿本三册藏于上海图书馆，时间起自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一日，迄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缺光绪十四、十五两年，日期也非连贯，2019 年由张剑、郑园整理出版，收入《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许庚身日记多是流水记事，读之颇无味，但诚如整理者所言，与其他资料对读，可收相互发明之妙，[⑦] 且由于日记史料的特殊性，许庚身在日记中记录的军机大臣交游与议事，较之史料笔记更加贴合实情，为了解甲申至甲午间军机大臣关系提供了侧写。

一、许庚身与各枢臣亲疏关系

许庚身，字星叔，浙江仁和人。咸丰初年许庚身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受咸丰皇帝赏识，入军机处充章京。同治元年（1862）许庚身中进士还就本官，历鸿胪寺少卿，内阁侍读学士，光禄寺卿，礼、户、刑各部侍郎。光绪十年三月入直军机处学习行走。[⑧] 基于资历、性格、私交的差异，许庚身与甲申易枢后诸军机大臣亲疏关系不一。

决定军机大臣间亲疏关系的客观因素是年龄资历。清人年龄有实年和官年的区别，实年是真实的年龄，而由于各种原因，填在朱卷、履历、官书上的年龄往往与实际年龄有区别，被称为官年。有些实年和官年的区别甚至很大，因此清人的真实年龄不易考察，但诸人间相对年龄差距仍可作参考。按照惯例，每年伊始军机处需遵旨开列王公大臣的年龄和生日进呈皇帝御览，

---

①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 8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年，第 1003 页。

② 如宋希斌认为甲申易枢后军机处新班子素质大为降低，军机处权力被醇亲王掌握，而醇亲王唯慈禧太后马首是瞻，军机处职权较恭亲王时期更加萎缩。见宋希斌：《清代军机处职权的来源及其演变：以公文运转程序与政局变动为核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48 页。

③ 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生平概况，在《清史稿》《清史列传》中皆有记载，但不免简略。晚清民国以来，报刊、笔记小说对诸人及甲申至甲午间的军机处情形或有涉及，间有可资借鉴而需进一步考订、辩说者。目前相关的探讨多为诸人书画和文人交游。相较而言，对甲申后政事政局研究集中于阎敬铭、孙毓汶，然而主要为史实大体梳理。

④ 《清史稿》卷 114，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270 页。

⑤ 马忠文：《晚清日记书信考释》，凤凰出版社，2021 年，前言第 1 页。

⑥ 如《枢廷载笔》《李文清公日记》《王文韶日记》《荣庆日记》《鹿传霖日记》《醇亲王载沣日记》《那桐日记》《徐世昌日记》等。

⑦ 张剑、郑园整理：《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上册，中华书局，2019 年，前言第 10 页。

⑧ 《清史稿》卷 439，第 12398 页。

以光绪十二年正月王公大臣年岁生日单为例，可见甲申易枢后诸军机大臣的年龄，摘录如下："礼亲王世铎，年四十四岁，七月初一日生日"；"大学士额勒和布，年六十一岁，正月十二日生日"；"大学士阎敬铭，年七十岁，九月十六日生日"；"协办大学士张之万，年七十六岁，七月初八日生日"；"署尚书许庚身，年六十二岁，六月十四日生日"。① 由于年岁生日单只开列权贵和重臣，故是年并未开列孙毓汶。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孙毓汶由吏部侍郎迁刑部尚书，次年年岁生日单方出现孙毓汶，该单载孙毓汶当年年仅五十七岁。② 照中国人习惯称虚龄推算，则世铎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额勒和布生于道光六年，阎敬铭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张之万生于嘉庆十六年，许庚身生于道光五年，孙毓汶生于道光十四年。

礼亲王世铎在诸军机大臣中年龄最小，但地位崇高。世铎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九世孙。代善年轻时随父征讨，立有战功，其母佟佳氏为努尔哈赤元妃，因兄长褚英早逝，故代善久为努尔哈赤众子之长。皇太极、顺治帝之继位，代善均有拥立之功，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中，礼亲王、克勤郡王、顺承郡王皆出自代善家族。世铎于道光三十年袭礼亲王爵，同治年间授侍卫处内大臣、宗人府右宗正。③ 内大臣为从一品，与领侍卫处内大臣、散秩大臣"掌统领侍卫亲军，以先后宸御，左右翊卫"；右宗正由宗室王公担任，协助宗令"掌皇族之属籍，以时修辑玉牒，辨昭穆，序爵禄，均其惠养而布之教令"。④ 从世铎的家世和任职可以看出，其在亲贵宗室中地位尊贵。辛酉政变以后，原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运作模式代之以太后垂帘、亲王入枢秉政的方式。在亲王领枢体制下，世铎在诸军机大臣中地位较高。有谓：

> 同、光以后，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耳。次者仅乃得参机务。
>
> 枢臣入对，序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晚近领以尊亲，势尤禁隔，旅进旅退而已。⑤

许庚身的军机日记所见其与世铎公务外的交游仅寥寥数事。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十日，许庚身邀请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诸军机于四槐轩小聚，"谈宴极畅"。⑥ 此外则是贺唁之事。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一日，世铎母亲的七十岁寿日，许庚身和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一同前往祝贺，世铎留众人观剧至傍晚。⑦ 是年十一月十三日，世铎母亲去世，许庚身两次与他人前往吊唁。⑧ 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世铎与许庚身、额勒和布前往张之万家，为张之万祝寿。⑨ 总体而言，许庚身、世铎二人的交游显得相对礼节性。

张之万（字子青，道光二十七年状元）、阎敬铭（字丹初，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年长，二人功名也较早，故二人在军机大臣中资历最老。额勒和布（号筱山，一作小山、筱珊）年龄与许庚身相仿，但在军机大臣排位中仅次于礼亲王世铎，且由于光绪十年、十一年间，内阁大学士连续出缺，额勒和布最早正拜。甲申易枢中，武英殿大学士宝鋆休致，协办大学士李鸿藻降二级调用，是年五月，协办大学士文煜迁大学士（后补宝鋆之缺），导致两个协揆均出缺，清廷授额勒和布、阎敬铭为协办大学士；十月文煜病故，遗缺由体仁阁大学士灵桂补授，额勒和布得补体仁阁大学士；至光绪十一年秋，大学士灵桂、左宗棠相继去世，阎敬铭遂正拜，所遗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 1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6–7 页。
② 《光绪朝上谕档》第 16 册，第 10 页。
③ 《清史稿》卷 216，第 8972–8976、8980 页。
④ 《皇朝文献通考》卷 86《职官考十》;《皇朝文献通考》卷 80《职官考四》。
⑤ 《清史稿》卷 438，第 12391 页；卷 439，第 12408 页。
⑥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下册，第 504 页（以下征引《许庚身日记》皆从《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下册析出）。
⑦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第 529 页。
⑧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第 545、546 页。
⑨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 589 页。

协揆之位授予张之万。清代内阁位于六部之上，大学士为百官之首，自设军机处后，大学士处理的题本渐成具文，然而大学士位尊望重，颇为官场敬重。因此，许庚身在日记中多称三人为“相”“相国”，或作“青翁”“丹翁”“小翁”以示尊敬，但在个人交游上，许庚身与三人的亲疏关系有所不同，兹将四人相互招宴摘抄：

以下光绪十一年：

七月二十一日，“未刻往赴张子青福寿堂之招”。

十月初一日，“未刻赴丹初协揆之招，子青、容方、莱山、子密同席”。

十月初十日，“是日邀礼邸、额小山相国、阎丹初协揆、张子青尚书、孙莱山少司空小集四槐轩，谈宴极畅”。

十一月初十日，“赴天寿堂承子青尚书音樽之招”。

以下光绪十二年：

正月二十四日，“未正赴张子青尚书之招”。

八月二十七日，“赴张青翁之招”。

十二月初十日，“申初散直，即赴丹初相国之招，上灯回寓”。

以下光绪十三年：

正月二十四日，“至白云亭画稿，即赴青翁之招”。

五月十九日，“未刻赴青翁福寿堂之招”。

七月十三日，“赴南皮相国之招”。

九月十五日，“赴青翁之招”。

九月十九日，“邀沈仲复、张子青、额小山两相国、劼侯、燕甫、莱山、颂阁小集四槐轩，劼冈因请假未到”。

以下光绪十六年：

五月初十日，“未初散直，赴青翁之招”。

许庚身自光绪八年九月任刑部侍郎，十一年十二月署兵部尚书，在刑部、兵部皆需办公。十三年九月，许庚身改吏部侍郎，仍署兵部尚书，次年正任，直至十九年去世。张之万于光绪九年正月任刑部尚书，直至十五年正月，因张之万授大学士，照例不再任部院大臣。额勒和布则自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以大学士管理兵部十余年。许、张在刑部共事近五年，而直到光绪十六年，许、额共事已有六年，但从上文来看，许庚身赴张之万的宴会最频繁，与之对比，日记中却鲜有年纪相仿的额勒和布招宴。在许、额私游方面，许庚身仅记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因署兵部尚书，前往额勒和布家道喜，以及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往吊额勒和布嫂子之丧。[①] 张之万与额勒和布性格、行事的差异，或是许庚身与二人亲疏的主要原因。《清史稿》评价张之万“练达”，额勒和布“木讷寡言，时同列渐揽权纳贿，独廉洁自守”。[②] 费行简更有引申，称张之万聪明敏捷，善于书画等风雅应酬，为人却工于迎合，入直军机处后更是广纳贿赂。额勒和布则直同哑人，然而操守颇可赞赏。[③] 费行简之说不免有舛误和夸张，却可得一定佐证。张之万虽是北人，但与江浙南士有比较好的私交。其于同治九年十月任江苏巡抚，次年奏请开缺养亲，在苏州六年余。张之万在苏州与江浙南士以园林、宴饮、戏曲、书画相交，成一时风雅。[④] 额勒和布久有清操之名，光绪九年张之洞致信张佩纶，谈及与张佩纶同行的额勒和布，言“素闻其

---

①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第 508、565 页。

② 《清史稿》卷 438，第 12391 页；卷 439，12398 页。

③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 年，第 94–95 页。

④ 沈慧瑛：《张之万在苏州的朋友圈》，《档案天地》2015 年第 6 期。

人甚好”“自必超越凡俗”。张佩纶函中评价额勒和布：“清俭宽和，甚有大臣之度。”[①] 光绪十六年，樊增祥曾书禀张之洞曰：

>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②]

据黄濬考证，“大圣”“相王”“洨长”“北池”“腰系战裙”分别为孙毓汶、世铎、许庚身、张之万、额勒和布。信中所言军机大臣终日宴会、贿赂公行，独额勒和布不与其间，在许庚身日记中即得到了反映。阎敬铭与许庚身同在总理衙门，因而常有公事往来，二人同样有着不错的私交。仁和许家与阎敬铭久有往来，上述亦见阎敬铭、许庚身二人多次招宴。光绪十二年春，阎敬铭因昏晕跌伤，连续被赏假两日，四月又患肝疾。二十日，许庚身在日记中载：“召见后，出东华门视阎丹初疾。”[③] 自是年五月后，阎敬铭屡次称病奏请开缺，五月初九日、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二十日、八月十四日、九月初六日，许庚身皆散直后前往阎敬铭处探病。[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阎敬铭档存有三封许庚身所写短笺，或书问阎敬铭疾，或馈赠礼物，均可见二人之交谊。[⑤]

相较而言，各军机大臣中，许庚身与孙毓汶最相熟。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人，咸丰六年（1856）榜眼。咸丰十年丁忧在籍，被劾抗捐，为恭亲王奕䜣所恶，遭革职遣戍。同治元年以捐输复原官，先后放四川、福建、安徽等地考差、学差，光绪九年授工部左侍郎。[⑥] 许、孙在咸同年间已有较深的交往。同治九年至十一年，孙毓汶任福建学政时二人常信件往来。[⑦] 在许庚身的军机日记中，记载孙毓汶招宴亦颇多。此外，许庚身与孙毓汶同为咸丰二年壬子科举人，其子许之鹏娶孙毓汶之女，故许庚身在日记中常常称呼孙毓汶为“莱山亲家”“莱山同年”。比如光绪十一年七月三十日载，“孙莱山亲家来谈”；十二月十四日载，“申刻赴松寿泉少宰之招，同席额小山相国、张子青协揆、麟芝庵少司空、孙莱山同年，戌初回寓”。[⑧] 科举同年以及姻亲是相对重要的人际关系，表明了许庚身与孙毓汶有较深的私交。

二、许庚身与醇亲王奕譞交际

奕譞，字朴庵，号九思堂主人，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生父。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打倒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势力。时奕譞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控一定兵权。在政变中，奕譞缮写谕旨，宣示载垣、端华、肃顺之跋扈不臣，并

① 《张之洞档》，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档案号：甲 182-371；《致奎乐山廉访》，张佩纶：《涧于集·书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68 页。

② 黄濬：《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13 年，第 363-364 页。

③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日，第 522 页。

④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六日，第 523、525、527、537、539 页。

⑤ 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第 17、18 册，大象出版社，2011 年，第 298、504、505-506 页。

⑥ 《清史稿》卷 436，第 12371 页。

⑦ 《孙毓汶使闽日记》，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同治十一年正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第 48 册，第 194、267 页。

⑧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498、509 页。

会同睿亲王仁寿拿问肃顺。因在政变中的选择，奕譞得两宫信赖，后负责管理神机营事务。[①]光绪帝入继大统后，奕譞骎骎达于权柄。在同治帝升祔一事中，奕譞奉旨参与讨论并表达意见，有不俗表现。[②]中俄伊犁交涉事起，奕譞再掌神机营事务，并参与会议中俄修约事宜。[③]光绪九年五月，奕譞奉旨会筹法越事宜；甲申易枢后，懿旨命“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④]奕譞由是实际操控军机处权柄。

目前所见许庚身与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已有政治联系。辛酉政变不仅仅是奕䜣和两宫皇太后共同谋划，更是京城、热河两地王公大臣合力发动的结果。奕譞在诗稿中屡次回忆庚申、辛酉之事。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召诸王公大臣入养心殿商量同治帝亲政事宜，奕譞作诗纪之。全诗多为溢美之词，但第五句有注谓：“又蒙谕曰：奕譞热河随扈，深知一切艰难”，“已革郑亲王端华曾在避暑山庄惠迪吉门以酒食诱臣，臣弗从”。[⑤]反映了奕譞于热河对慈禧太后的政治支持。而许庚身在咸丰帝逃亡热河后，曾作为军机章京前往入直，其以肃顺骄怙非制，屡逆肃顺之意，双方因而结怨。[⑥]在政变前夕，入直热河的汉军机章京给北京同僚写了数封密信，共十二札传世，统称为《热河密札》。其中第四、第十一札寄信人为“守黑道人”（一作“守愚道人”），据俞炳坤考证，该人即是许庚身。正因在辛酉政变的作用，日后许庚身获得了两宫皇太后及奕䜣的提拔。[⑦]《热河密札》第十一札为许庚身致结一庐主人（在京之军机章京朱学勤）信：

> 连日闻内里传出信云，自前日明发要下，二圣怒极。“是诚何心”一语（弟已嘱子建将此稿密藏），七先生亦大怒，云俟进城讲话，老五太爷喝止之。[⑧]

密札所言为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大臣围绕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所发生的激烈争论，信中的“七先生”即指醇亲王奕譞。朱学勤与奕譞关系紧密，此信虽未可证明许庚身与奕譞有直接合作，但可证许庚身、朱学勤、奕譞的政治站队与政治合力。

同治元年，许庚身中进士，照例本应进翰林院，但其仍在军机章京行走，据曾侄孙高阳（许晏骈）解释，因太平天国军事紧急，恭亲王奕䜣对江浙及长江上下游情形所知有限，因而军报、地形必须有人为他讲解及指授方略，所以仍将许庚身留于军机处，[⑨]兼之许庚身久署、任兵部尚书，故《清史稿》言许庚身在枢垣三十年与兵事相始终。甲申易枢后，许庚身同时兼任总署大臣，因应对敏练为慈禧太后所信仗，在军机处、总署有较大的权势。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中法在巴黎的秘密和议初有成效，双方同意以去年“李福协定”为依归，主持总署事务的奕劻拟三条草议请旨，慈禧太后随命奕劻、许庚身前往醇王府面商，反映了许庚身的帘眷。[⑩]出于这种公私情况，中法战争期间，奕譞与许庚身多有军事谋议，故宫军机处档藏奕譞关于中法战争的信件，多有致“许大人”，所指即为许庚身。[⑪]

然而由于圈子的不同，许庚身与奕譞似乎更多只是公事往来。奕譞雅好诗文，在其著《九思堂诗稿》及续编中，与世铎、张之万、孙毓汶皆有唱和，却不见与许庚身诗交。不过通过许

---

① 《清穆宗实录》卷 5，咸丰十一年九月乙卯。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年六月戊戌，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39–445 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 122，光绪六年十月甲子；卷 129，光绪七年四月丙午。

④ 《清德宗实录》卷 163，光绪九年五月戊申；卷 179，光绪十年三月己丑。

⑤ 奕譞：《九思堂诗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4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7 页。

⑥ 《清史稿》卷 439《许庚身传》，第 12398 页。

⑦ 俞炳坤：《热河密札考析（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 年第 1 期。

⑧ 《热河密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36 号，中华书局，1978 年，第 12 页。

⑨ 高阳：《我的老家“横桥吟馆”》，《高阳杂文》，海南出版社，1997 年，第 31 页。

⑩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 4 册，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一日，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908 页。

⑪ 《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全编》第 3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555 页。

庚身的军机日记，也可看出许庚身、奕譞二人在甲申年后有一定私交。中法战争后清廷议及筹练海军，经沿海各督抚等讨论，清廷设立总理海军衙门，并先编练北洋水师作为全国海军的示范。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慈禧太后颁下懿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听调遣，派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①] 在此前后李鸿章在京筹商海防，奕譞与其多次见面，商定明春海军成军后，奕譞亲往校阅。[②] 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许庚身记："头起许振祎，二起醇王，三起军机"，此次距上次奕譞叫起已隔十日，其后二月二十九日、三月初三日奕譞皆叫起。[③] 奕譞与慈禧太后所谈的内容日记中未记，但应该包括了谒陵事宜以及奕譞表达巡阅北洋水师的意向。四月初九日，奕譞与帮办海军都统善庆、海军衙门文案总办恩佑请训出京。次日许庚身为奕譞等送行："入直，无召见，辰正回寓，午后至白云亭画稿，顺道拜客十余家，并为醇邸送行，申初回寓。"是日翁同龢与阎敬铭等在户部会议公事，并未去送行。[④] 可见此为许庚身私人相送，并非类似公事的站班。此外，招宴与礼物馈赠亦是私交礼节。日记中仅记载了一次许庚身赴奕譞的招宴，八月二十一日条谓："巳初赴醇邸之招，亥正回寓。"[⑤] 此外再无其他奕譞招宴的记录，但可以看出此次招宴竟长达半天。荔枝当时被认为是珍果，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奕譞赠许庚身荔枝二十枚，其时许庚身亦欲以荔枝相赠，故在日记中感慨："不谋而合，亦一奇也。"[⑥]

许庚身军机日记中更多记载了他对奕譞光绪十三年、十六年两次大病的关注。

光绪十三年夏间，奕譞病情反复，自八月十三日精神萎靡，呕吐不能进食，病情忽然加重。十九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面谕传知海军衙门、神机营，将两处事宜暂归庆王奕劻管理。[⑦] 奕譞此次大病由是引起朝野关注，十月以后慈禧太后、光绪帝曾多次前往醇王府问疾。军机大臣亦然，八月二十日散直后，许庚身与孙毓汶便前往醇王府探视。[⑧] 此外，许庚身等人还曾奉旨前往视疾，因许庚身光绪十四年日记有缺，仅摘录光绪十三年的记载如下：

九月二十日，"午初散直，同莱山至醇邸传旨问疾"。

十月二十二日，"散直后同礼邸、莱山遵旨往视醇邸病状"。

十一月十四日，"午初回寓，奉懿旨往视醇邸疾"。

时凌绂曾（字初平）奉旨为奕譞治病，许庚身还通过凌绂曾打听奕譞的病情，比如八月二十二日日记载："初平来寓，知醇邸服伊方剂见效。"[⑨] 许庚身对奕譞病情的关注另有向慈禧太后报告的需要，即《翁同龢日记》所言："余每问醇邸起居，上曰宫中内常有人去，但归时到太后前复命，偶来，不常来也。"[⑩] 因此，若翁同龢、光绪帝不前往醇王府探视，二人对奕譞的病状颇茫然，比如十月二十三日，即许庚身等军机大臣探视的第二天，翁同龢竟得到消息谓奕譞已病故，但密而不发，使翁同龢颇感惊骇。[⑪] 十一月十五日，翁同龢、光绪帝的对话，更是折射出二人对军机大臣、慈禧太后的不满情绪：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64辑，中华书局，1995年，第841–851页；《清德宗实录》卷215，光绪十一年九月庚子。

② 奕譞：《九思堂诗稿续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42册，第428页。

③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光绪十二年三月初三日，第518、519、519页。

④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二年四月初十日，第521页；《翁同龢日记》第4册，光绪十二年四月初十日，第2015页。

⑤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第538页。

⑥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九日，第585页。

⑦ 《光绪朝上谕档》第13册，第293页。

⑧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第572页。

⑨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第572页。

⑩ 《翁同龢日记》第4册，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第2152页。

⑪ 《翁同龢日记》第4册，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第2154页。

巳正入，上曰：“徐某方有效，而因用鹿茸冲酒，不令诊脉矣，此何也？”臣未对。上又曰：“余意仍服徐方耳。”又问：“今日往问候耶？”臣对：“无事不往。”上曰：“明日可一往。”①

所言为奕譞服徐延祚的药方后病情好转，但其后徐延祚开方以鹿茸冲酒，慈禧太后便不让徐继续为奕譞治病，令主张用徐方的光绪帝颇不悦。从许庚身的军机日记得知，军机大臣实际上昨日曾前往醇王府探视，但从光绪帝与翁同龢的此段对话中可以发现，军机大臣应未向光绪帝报告醇亲王奕譞的情况，故光绪帝让翁同龢明日亲往探视。由此不难窥见军机大臣在高层政治抉择中颇微妙的角色。直至光绪十四年夏间，奕譞之病方略有好转。

光绪十六夏间，奕譞再次大病。是年七月初八日，许庚身听闻奕譞痰涌昏厥半时，醒后吐痰甚多，神志不清，慈禧太后及光绪帝皆前往探视。② 相较于光绪十三年之时，许庚身在此后四个月内，于日记中更加频繁记载光绪帝探病情形及其听闻、探视的奕譞病情，说明了许庚身极高的政治敏感度：

七月初九日，“是日醇亲王病势稍轻”。

七月初十日，“辰正散直，往视醇邸疾，知服药颇效，已见轻减”。

八月初二日，“醇亲王病势又剧，皇上办事后亲往看视，寅正二刻召见庚，卯初一刻回寓……闻醇邸病少差”。

八月初三日，“卯初圣驾亲往看视醇邸，卯正庚回寓……是日醇邸病势见好”。

八月初八日，“是日寅正召见，因十一日祭社稷坛，皇上进宫斋宿，先往醇王邸中看视后返斋宫也”。

八月十八日，“辰正上诣醇邸视疾，酉初还瀛台”。

八月二十三日，“醇邸遣人抄示脉案，并问凌初平何时到京”。

九月十七日，“凌初平因醇邸腑气未降，留于邸第，日夕遣人以方来示”。

九月二十一日，“辰初散直，至醇邸处一行，即回寓”。

十一月十四日，“醇邸病势反复”。

十一月十五日，“凌初平宿醇王府中，以备早晚诊脉开方”。

十一月十七日，“辰正上诣醇邸看视”。

十一月十九日后，奕譞病情已近无力回天，是日军机大臣随光绪帝前往醇王府。枢臣告知翁同龢，称奕譞意识已不清醒，话语模糊不能辨别。时许庚身身处其间，他的日记记载奕譞临终情形更加详细：“醇邸奄卧在床，尚能识人，呼青翁‘师傅’二字犹可辨也。”③ 此时政治敏感的许庚身已作奕譞逝世后的准备。二十日，因听闻奕譞病势垂危，许庚身于未刻即知会军机大臣中关系亲密的孙毓汶入城暂住其家。④ 至次日丑时三刻，奕譞于醇亲王邸病逝。许庚身通常寅刻到直，但在是日丑正即到军机处，⑤ 结合先行招呼孙毓汶入城的情况，可见其消息之灵通。

三、军机大臣之议事

乾隆以后军机处在中枢决策各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基本确立，嘉庆、光绪两朝《大清会典》已将军机处列入常设的正式机构，并载明军机大臣之职权，二者文字无太大区别。据光绪《大清会典》归纳，军机大臣的职权有撰拟谕旨、入直备召、与议政务、顾问考证、人事开单、参

① 《翁同龢日记》第 4 册，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第 2159 页。

②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六年七月初八日，第 592 页。

③ 《翁同龢日记》第 5 册，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第 2413 页；《许庚身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第 609 页。

④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第 609 页。

⑤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609 页。

与典礼、档案工作数端，这些大多是承旨办事或程序性的工作，故曾充军机章京的赵翼认为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①] 然而，从条文制度记载中可以发现，军机大臣实拥有奉旨后“议大政”的权力。[②] 这些军机大臣可议之“大政”，或是由军机处承办，或会同各部院衙门商办。[③] 刘文鹏对雍正朝议复档的研究，也表明军机大臣并非仅仅是皇帝的传声筒，而是可以通过议复的方式参与中枢决策。[④] 熟谙晚清政事的吴燕绍曾述及甲申易枢以后诸军机大臣在议事中不同的权势：

> 尔时枢廷领袖为礼亲王，一物不知，惟利是图，无论何人，均可拜门，以千金寿，辄畀荐牍，向当道干谒，刺刺不休。满大学士额勒和布，伴食而已；汉大学士张之万，以书画音乐自娱。其中枢执要者，唯济宁孙毓汶、仁和许庚身马首是瞻。[⑤]

这种说法被普遍引信，然而细察相关史事，吴燕绍之论仅是统而言之。甲申易枢以后，军机处议事出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其一为醇亲王奕譞隐掌中枢，其二为枢、译分家。许庚身的军机日记及相关的材料，能更详细地反映军机大臣议事的实情及权势演变。

对于重要的事件，慈禧太后会颁下懿旨，命奕譞、军机大臣会同各部院公议。许庚身的军机日记记载了三次会议，分别是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前往总署会议中法战后海防善后事宜，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前往户部会议钱法整顿，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往户部会议黄河分流方案。[⑥] 三次会议上奕譞皆态度坚决并出拟条陈，大部分部臣、军机大臣或“作壁上观”，或仅是“嘿嘿”随声附和，在黄河分流的会议中，军机大臣们甚至在奕譞、户部、工部会议近一个时辰后方至。[⑦] 更常见者则是奕譞与军机大臣往返函商。仅就军机处所藏信件来看，奕譞与甲申易枢后军机大臣讨论的事件便包括中法战争、朝鲜甲申政变、黄河河工、海防善后、兴修铁路、新疆建省、京师练旗、东北练军、蚕池口教堂搬迁、中英缅甸交涉、华工问题、中法勘界、洋药税厘并征、北洋水师横滨事件、颐和园园工等。[⑧] 这些信件部分有“缮递”“未递”字样，比如光绪十一年中秋节信函写有“未递”，九月初八日信函旁注“初九日缮递”。“缮递”“未递”字样即军机处是否已呈递慈禧太后阅览之意。[⑨] 除会同合议和函商外，在许庚身的军机日记中还可见到军机大臣所谓的“过府”面商。如《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一条记曰：“晴。召见，散直后回寓，未初礼邸过寓，同至醇邸商议公事。”[⑩] 礼邸，即礼亲王世铎；“公事”不知为何，但既然称作“公事”，自然不是寻常事务。前文言及礼、许关系一般，二人在公事上似乎仅军机处事务有所交集。会议中奕譞的表现、信函流转方式及“过府”面商，皆反映了奕譞在军机处讨论重要事件过程中有着关键的影响。当然，值得说明的是，奕譞隐掌军机是有限度的，一方面议事之权缘于懿旨，另一方面最终决策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总署设立之初原是作为军机处处理洋务的临时机构，其后总署的职权逐步扩张。尽管有学

---

① 赵翼:《簷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 年，第 3 页。

② 光绪《大清会典》卷 3《办理军机处》。

③ 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38 页。

④ 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

⑤ 黄濬:《吴窸斋尊崇醇王之奏与军机处伪作之折》,《花随人圣庵摭忆》，第 820–821 页。

⑥《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501、527、547 页。

⑦《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五日),《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 508 页;《翁同龢日记》第 4 册，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2032、2074 页。

⑧ 以上见于《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文献丛编〉全编》第 3 册，第 555–588 页;《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续)》,《〈文献丛编〉全编》第 4 册，第 69–77、157–170 页;《军机处杂档中之尺牍五通》,《〈文献丛编〉全编》第 5 册，第 507--509 页；方裕谨整理:《清醇亲王奕譞信函选》,《历史档案》1982 年第 4 期；方裕谨整理:《清醇亲王奕譞信函续选》,《历史档案》1983 年第 1 期。

⑨ 方裕谨整理:《清醇亲王奕譞信函选》,《历史档案》1982 年第 4 期。

⑩《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第 503 页。

者认为总署的地位不能与军机处并列，总署仅为办事机构，而非如军机处一类的决策机构。[①] 然而军机大臣兼任总署大臣，在军机处议事中无疑具有一定的权重。尤其是甲申以后电报大量运用，军机处与驻外公使、督抚的电文来往，大多数时候皆需通过总署，总署因此成为信息上传下达的枢纽。甲申易枢之始，负责总署事务的奕劻等人曾入奏谓：

> 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枢密之繁，当以洋务为要政。朝廷重洋务，则必重视总理各国事务之衙门……故臣等以为，枢臣不兼理洋务，不成其为军机大臣，而总署不责成枢臣，亦不成其为总理衙门。[②]

上述奕譞与军机处的信函，便是大部分牵涉洋务，需要同时和总署会商。甲申易枢后枢、译分家，军机大臣中仅阎敬铭、许庚身、孙毓汶曾兼任总署大臣。奕譞致军机处讨论中法战争的信件，除许庚身外其余多为写给阎敬铭。[③]《许庚身日记》中同样有三人“过府”面商洋务的记载：

光绪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入直……未正三刻庆邸过寓，同阎丹翁及余至醇邸议论洋务”。

六月初七日，“未正庆邸、莱山过我，偕至醇邸商议事件，酉初回寓”。

十一月初一日，“散直后至总署商办事件，申初同莱山往见醇邸，酉初回寓”。

庆邸，即庆郡王奕劻；洋务，为晚清语境下的对外交涉事件。从当时奕譞致军机处的信件可知，第一条所言应是北洋开办银行之事。第二、三条所言为中英缅甸交涉。

基于上述两个变化，甲申易枢后军机大臣议事权势的消长与人事亲疏、职任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奕譞对其兄恭亲王奕䜣的政治路线素持反对意见，光绪帝继位后，奕譞以皇帝生父之尊，久思染指奕䜣之权，故甲申年借朝局变动之机，与慈禧太后合谋易枢。随着《朴园越议》等史料的出版，有学者对奕譞是否参与谋划表示怀疑。[④] 然而不可否认，诸军机大臣在易枢前，大多与奕譞有着较紧密的关系。许庚身与奕譞在甲申前的交际上文已述。额勒和布在其同治日记中多次记载前往拜会奕譞，虽仅礼节性地得见一次，但足可证明二人早已交游。[⑤] 据《清史稿》记载，恭亲王奕䜣罢政后，因醇亲王奕譞为皇帝生父，不便入直军机处，故慈禧太后曾与奕譞商量领班亲王人选，奕譞便举荐礼亲王世铎；而孙毓汶则在此前便“习于醇亲王”，以致后世一度怀疑孙毓汶为甲申易枢的主谋之一。[⑥] 张之万为奕譞上书房师傅，奕譞对张之万颇敬重，由上文所述其临终前仍呼张之万为师傅可见一斑。有谓抓拿肃顺过程中，张之万与奕譞曾共同筹划。[⑦] 阎敬铭在甲申易枢各军机大臣中是为数不多有才干之人，慈禧太后选择阎敬铭入枢实是表明易枢后朝廷治事的决心，即所谓的阎敬铭“初直枢廷，太后颇信仗之”。[⑧] 阎敬铭与奕譞在甲申年之前并无晤面，但在其后阎敬铭与奕譞交好。在对“清流”的处罚上，阎敬铭更是讨好奕譞将张佩纶远戍。[⑨] 甲申易枢后一段时间内，仅阎敬铭、许庚身兼任总署大臣。光绪十一年后，阎敬铭逐渐为慈禧太后所厌恶，是年三月十九日张佩纶致李鸿章的信件中便道及“上意渐厌丹，

---

① 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41–42 页；宋希斌：《清代军机处职权的来源及其演变——以公文运转程序与政局变动为核心的考察》，第 166–183 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年，第 112–113 页。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③《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文献丛编〉全编》第 3 册，第 555 页。

④ 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年谱》，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17 页；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年，第 147–148 页。

⑤ 芦婷婷整理：《额勒和布日记》上册，同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凤凰出版社，2018 年，第 62 页。

⑥《清史稿》卷 216，第 8980 页；《清史稿》卷 436，第 12371 页；高阳：《同光大老》，华夏出版社，2006 年，第 30–32 页。

⑦ 张达骧：《南皮张氏兄弟事迹述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35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90 页。

⑧《清史稿》卷 438，第 12385 页。

⑨ 光绪十年三月十六日，奕譞致信翁同龢谓：“阎初谋面。”见《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四十六》（光绪十年三月十六日），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四，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 年，第 115 页；《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 470 页。

惟楚兄醴酒未怠”。[①] 说明其时慈禧太后尚对阎敬铭存有敬意，及光绪十二年因园工问题，阎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大忤慈禧太后之意，自是年五月起至八月，阎敬铭连续称病请假。至九月二十七日，阎敬铭被慈禧太后罢直军机处。[②] 甲申易枢后排位最低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则帘眷日隆。光绪十一年六月，孙毓汶从“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变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入直总署。其时许庚身事务繁忙，需于总署觅得帮手，许、孙关系亲密或是慈禧太后引孙毓汶进入总署考虑的因素之一。[③]

从上引世铎“过府”的记载可知，作为领班军机的世铎并非吴燕绍所言的“一物不知”。然而他始终不是总署大臣，对于一些事务参与度不高，中英缅甸交涉可作典型。中英缅甸交涉缘起于光绪十一年九月间驻英公使曾纪泽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提醒，总署将所接曾、李之电通过军机处呈递慈禧太后。[④] 根据《许庚身日记》记载，十八日军机大臣叫起。[⑤] 检阅是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有军机处奏片三件，第二件记曰“醇亲王信函录呈慈览由”，应是奕譞关于缅甸问题的信件，通过军机处呈递慈禧太后；第三件记曰“遵拟电知李鸿章等二道缮稿呈览由”，第二道“遵拟电”即根据慈禧太后意见（慈禧太后或参考了奕譞信函）草拟的回复曾纪泽电谕稿。[⑥] 该电谕稿呈递慈禧太后阅定后，“发下由堂交总署”。[⑦] 总署随即将上谕通过电报寄与曾纪泽，要求其与英国方面交涉，是为缅甸交涉明线。[⑧] 此外，奕劻等总署大臣于二十四日与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会面，请他先行通过私人关系和英国交涉，是为缅甸交涉的暗线。[⑨] 由此大体可说明军机处、总署的权责分工，即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前者为决策机构，后者起居中传达及具体执行的作用，军机处的决策主要执行的是慈禧太后、奕譞的意志（所谓的“遵拟”）。

然而军机大臣并非仅为传声筒，他们实际也参议其事。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初七日，军机大臣随同慈禧太后、光绪帝前往清东陵，奕譞也一同随往。二月二十九日、三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召见了奕譞和军机大臣。[⑩] 奕譞的《文母返神京恭纪一律》诗中有注，“钦奉懿旨随扈，以备偕军机大臣商办事件”，“沿途命办理缅甸事”。[⑪] 既谓“商办”，军机大臣自然可议事，可表达意见。不过议事时军机大臣各自的话语权重应不一。是年上半年，中英缅甸谈判陷入僵局，英国坚请按照《烟台条约》予以英国马科蕾使团入藏，以对清廷施加压力，清廷在西藏和藩属国缅甸之间作出抉择，加紧与英国谈判缅甸问题。三月二十二日，清廷召驻英公使曾纪泽回京，至此曾纪泽在伦敦的交涉无果，中英缅甸谈判重心转移至北京。许庚身四月以后日记连续有入直总署的记载：

四月十三日，“午正后至总署，傍晚回寓”。

四月二十一日，“午正后到总署，申刻回寓”。

五月初九日，“散直后视丹老疾，即至总署”。

五月十七日，“至总署，晤英使华尔身、欧格讷”。

---

① 《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 474 页。

② 《清史稿》卷 438，第 12385 页。

③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中华书局，2006 年，第 75–76 页。

④ 《曾侯来电》，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 4 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12 页；《收北洋大臣电》，光绪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 4 册，第 612 页。

⑤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第 502 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12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517–518 页。

⑦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121 册，第 517 页。

⑧ 《奉旨印度出示招人运军往缅著李鸿章竭力辩阻事》，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 1 册，第 144 页。

⑨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科学出版社，1958 年，第 8 页。

⑩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光绪十二年三月初三日，第 519 页。

⑪ 奕譞：《九思堂诗稿续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742 册，第 448 页。

五月二十三日，“上库收放银两并至总署”。

六月初三日，“未正至总署，日夕回寓”。

六月初六日，“午正至总署，申初同席卿、莱山、仲复赴英使署，晤欧格讷”。

六月初七日，“未正庆邸、莱山过我，偕至醇邸商议事件，酉初回寓”。

六月初八日，“未刻同莱山至英馆议事，申正回寓”。

六月十一日，“未正至总署，欧格讷来见，缅藏事议定，即拟奏稿”。

六月十五日，“未刻至总署，酉正回寓”。

至六月十七日，奕劻领衔上奏缅甸交涉解决方案，拟请允与英使订立缅甸条约，以换取英人停止入藏。该折奉旨依议，慈禧太后并派奕劻、孙毓汶与英使互换条约。① 随后中英《缅甸条款》在北京画押。二十七日，许庚身前往总署，与总署大臣福锟、孙毓汶、续昌、沈秉成为欧格讷送行。② 据上引日记可知，中英缅甸交涉具体操作实际多由奕譞、奕劻及兼任总署大臣的许庚身、孙毓汶（阎敬铭此时连续称病请假）与署理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商议。与许庚身、孙毓汶相比，世铎、额勒和布、张之万则因非总署大臣，未能直接参与具体事务谈判。可以推测，军机处参议缅甸交涉时，奉命会办的奕譞及实操其事的许庚身、孙毓汶更有发言权，反映出晚清以后随着洋务的增多，兼任总署大臣之差在军机处权势之重要性。

四、结语

甲申易枢后，军机大臣相对稳定了十年。醇亲王奕譞在慈禧太后安排下隐掌军机处，各军机大臣大多与奕譞保持不错的关系。相对而言，孙毓汶、许庚身颇得帘眷和奕譞的信赖，孙、许二人在各军机大臣中关系亦最亲密。自同治以降至清末新政前，总署职权不断扩张，甲申易枢后军机处与总署分离，孙毓汶、许庚身久兼总署大臣。由于这种私交、公情，奕譞、孙毓汶、许庚身相互协商，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在军机处议事中权势颇重，如《清史稿》谓：

> 初，醇亲王以尊亲参机密，不常入直，疏牍日送邸阅，谓之“过府”。谕旨陈奏，皆毓汶为传达。同列或不得预闻，故其权特重云。③
>
> 时枢府孙毓汶最被眷遇，庚身以应对敏练，太后亦信仗之。④

许庚身的军机日记，即为军机大臣的关系及相关的议事权势提供了侧写。然而，从其日记中可以看出，礼亲王世铎其实亦是所谓的“过府”人员，并非通常认为的“一物不知”，只是由于资历太浅，不及奕譞“太上皇”之尊，乃至在各枢臣中也最年轻，且其从未兼总署大臣，故在议事中权势不如奕譞、孙毓汶、许庚身三人。光绪十七年，有人致张之洞密信云：

> 啸亭主人（按，指礼亲王昭梿，代指世铎）与过庭（按，指唐人孙过庭，代指孙毓汶）争权，近颇交恶。⑤

此信体现了作为领班军机的世铎与原权势较重的孙毓汶间之矛盾。信内言矛盾的凸显在奕譞去世不久，说明奕譞在世时，世铎、孙毓汶的矛盾尚可得到压制，即所谓“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⑥ 自光绪十六年奕譞病逝，军机处原有权力平衡消解，情

---

① 《总署奏与英使订立缅甸条约折》，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七日，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215-1216 页；《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123 册，第 161 页。

② 《许庚身日记》，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第 528 页。

③ 《清史稿》卷 436，第 12372 页。

④ 《清史稿》卷 439，第 12398 页。

⑤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 7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第 401 页。

⑥ 黄濬：《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花随人圣庵摭忆》，第 364 页。

形发生转变。礼亲王、孙毓汶之争成为看待光绪十七年至甲午期间军机处权力结构的另一条主线，许庚身之军机日记也暗寓着此端倪。

References

Jiang Ming. *Que jiang tanxiao xi cangliang: Wanqing de zhengju he renwu sanbian* (Dispelling sorrow with mirth: politics and figur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Vol. 3).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2020.

Liu Wenpeng. "Junji dachen yifu jizhi yu qingchao guojia zhengzhi tizhi chonggou" (The memorial-response procedure of the Grand Ministers of stat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Qing political system). *Zhongguo shehui kexu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2023).

Ma Zhongwen. *Wanqing riji shuxin kaoshi* (Exam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iaries and letter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Nanjing: Fenghuang chubanshe, 2021.

Shen Huiying. "Zhang Zhiwan zai Suzhou de pengyouquan" (Zhang Zhiwan's social circle in Suzhou). *Dangan tiandi* (Archives World) 6 (2015).

Song Xibin. *Qingdai junjichu zhiquan de laiyuan ji qi yanbian: Yi gongwen yunzhuan chengxu yu zhengju biandong wei hexin de kaocha* (The source of Junjichu's authority and its evolution in Qing Dynasty: focus on the procedures of official documents operation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2018.

Wu Fuhuan. *Qingji zongliyamen yanjiu* (A study on Zongliyamen of Qing). Urumqi: Xinjiang daxue chubanshe, 1995.

Yu Bingkun. "Rehe mizha kaoshi Shang"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secret Rehe Letters Part 1). *Gugong bowuyuan yuankan* (Palace Museum Journal) 1 (1982).

A Glimpse into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rand Councilors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in 1884: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Deliberations of Grand Councilors as Recorded in *Diary of Xu Gengshen*

LIU Qingfe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iuqf@cass.org.cn)

Abstract: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Grand Council in 1884, it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for a decad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Grand Councilors and their deliberation practices constituted important court politics before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Xu Gengshen and Sun Yuwen ha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and Xu had long maintained political connections with Prince Chun, Yixuan.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in 1884, the two continued to interact frequently both officially and privately. When important matters arose, Empress Dowager Cixi would order Yixuan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formal discussions, correspondence, or private visits. Yixuan held significant influence due to his stro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Grand Councilors and the authority granted by Empress Dowager Cixi. Xu Gengshen and Sun Yuwen, favored by both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Yixuan, and having long served concurrently as Ministers of the Zongli Yamen, also wielded prominent power. Although Prince Li, Shiduo, held a lofty position, his actual influence was relatively weak due to factors such as his seniority and concurrent appointments. *The Diary of Xu Gengshen*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s and deliberative power among the Grand Councilor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it also hints at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Shiduo and Sun Yuwen after Yixuan's death in 1890.

Keywords: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Grand Council in 1884, *The Diary of Xu Gengshen*, the Grand Council, Prince Chun (Yi Xuan)